

青岛观象一路1号是萧军与萧红的故居。

观象一路因观象山而得名,是一条半山的环形路。路旁是一个个居高临下的德式庭院,以花岗岩为基,院门都不宽,走进去后,迎面往往是十几级石阶,拾阶而上才可进入院内。

这种居高临下的庭院,在旧时青岛实属常见。当年德国人喜欢利用地势,沿山建设,庭院间彼此错落,极具美感的同时又巧妙地拓宽了房子的视野。萧军就曾在诗中写道:“碧海临窗瞰左右,青山傍户路三叉”,诗极粗糙,但倒写实,那时的观象一路1号乃至周边几条路的宅院,均可远眺大海。不过如今多了高楼大厦,这栋位于路口的德式小楼,自是再也听不到涛声。

小学时常去观象山玩,山顶有一栋欧式城堡,十分漂亮,即使放到遍布城堡的欧洲也算抢眼。那是德国人于1905年修建的气象观测所,也算是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发源地。我们还曾在山上的一个半地下碉堡里发现过一些遭人“遗弃”的武侠小说,公推手最长的同学从碉堡的枪眼处伸手进去,一本本拿出来。大家平时只在作文里写过自己捡了东西后拾金不昧,真捡到东西时反倒犯了难,七嘴八舌商量的半天,结果最后没有交给警察叔叔,也没有交给老师,反倒据为己有,大家轮流看,我就用它们打发了多堂数学课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时,这一带就颇为僻静,而再上溯五十年,也就是萧军萧红在此避世之时,这里想必更是沉静。

想来萧军和萧红一定喜欢此间沉静,他们本就是避难而来,颠沛流离间能寻得一处美丽所在,即使日子依旧拮据困顿,也少不了快乐。何况,他们还有爱情。

萧军与萧红的情事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悲剧,但他们客居青岛的日子却被后人形容为“精神蜜月”。那半年时光是他们最甜蜜的日子,离开青岛后,他们彼此猜忌,矛盾频生,终告分手,萧红更是在31岁时便客死异乡。多年后,当年迈的萧军重返青岛寻访故迹时,伊人早已逝去,空留怅惘。

如今,他们的故居仍保持原貌,只是外墙重新粉刷过,小院里有几棵松树。当年,萧军和萧红住在楼上,萧红负责家务,萧军则在某报馆编副刊,住在他们楼下的是约他们前来青岛的作家舒群夫妇。

那时,萧军与萧红也曾屡屡在这一条条老街上漫步。根据他们的回忆文字,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的场景:萧军在脖子上系个黑蝴蝶结,手里拿着三角琴,边走边弹。萧

【故人旧居】

□叶克飞



萧军萧红在青岛留影

红则总穿着花短褂黑裙子,跟在后面。

他们还会逛那间著名的荒岛书店——那曾是青岛文化人的乐园,文人学者荟萃,也有许多怀着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苦读。在这里,他们认识了一个名叫黄宗江的初中生,这孩子住在青岛的黄县路,后来老舍成了他的邻居,再后来,他成为了著名艺术家。他们还认识一个名叫李普的高中生,他后来成了新华社副社长。

那是一个风流人物莫问年纪与出身的时代,理想主义是无数年轻人的支柱,萧军曾回忆,自己在那段时间里“每至夜阑人静,时相研讨,间有所争,亦时有所励也”,然后便奋笔疾书。他的代表作《八月的乡村》便在此时诞生,而萧红也在此间写成《生死场》,这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两部作品。此后的萧军江郎才尽,萧红则在悲凄



## 【老照片】值乘呼京特快 遭遇唐山地震

□杜浙泉

上世纪70年代我在京包线东段(旧称京张铁路)担任运转车长。1976年7月28日这天,我值乘由呼和浩特开往北京的90次特快,凌晨3点半左右到达北京延庆康庄车站。

我坐在站台上,等待检车师傅“完活儿”的口头儿通知,突然,伴随着“稀里哗啦”的巨响,我不由自主地前俯后仰,但见列车和站台都

在做着幅度相当大的波浪式翻滚运动,震耳的声音来自列车颠簸时,机车及车辆零部件所产生的剧烈摩擦。整个过程也就是20多秒钟,我与众人刚从极度惶恐转入惊魂未定,只听有人喊道:“是不是地震啦?”大家恍然大悟地回应:“没错没错!”待缓过神定下心来,重又检查了每一节车厢,确认无碍,方才开车,此时已晚点10多分钟。

一路急赶慢赶,列车6时30分正点抵达北京站。我来到行车公寓,首先打听哪里地震了,得到的回答是“不清楚,反正别的线来车都正常,就是东北那边,一趟也没到!”因为要防备余震,我与呼京车班乘务员全都从三楼挪到一楼休息。虽说一夜未合眼,但由于余震不断,却难以入睡。后来得知,是唐山、丰南一带发生了里氏7.8级地震。

过了半个月,我被派往京郊某站,值乘一趟由15辆卫生车临时编组的“专列”,深绿色车外皮的右下角均有醒目的“W”字样(“卫”字打头),该车明显特点是人车窗较宽;站台上停着多辆救护车,从车里抬出担架,再由宽窗户进入车厢。原来此举是为减缓北京各医院震后伤员爆满的压力,使其集中力量医治危重伤者;而将部分伤员转移分散到各条铁路沿线较大城市。我所值乘的这趟车,便是开往包头的。铁道部对这趟车极为重视,临时调整了列车运行图,使得这趟车在行驶途中一路绿灯,始终保持中低匀速地到达目的地。

虽说已过40多年,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。(图片为笔者1976年的工作照)

困苦中于香港写下《呼兰河传》,那时的她已近生命尽头,用尽了最后的才情与精力。

作品虽然写成,但却一度无处发表。在荒岛书店里,萧军向友人孙乐文抱怨此事,孙乐文建议他直接给鲁迅写信,于是,萧军把自己和萧红的稿子一起寄给了鲁迅。鲁迅提携了他们,不但为《八月的乡村》和《生死场》作序,还建议二人改笔名,于是便有了含“小小红军”之意的二萧,他们的生活也就此改观。

可不再为生活拮据而发愁的同时,二人在性格上的鸿沟却就此暴露。萧红内向柔弱,十分依赖萧军,甚至已至病态,曾有记载,二人到上海后,曾同屋分房而眠,萧红会半夜哭醒,认为二人离得太远了。但才女如她,又有敏感自尊的一面,决非暴躁粗疏的萧军可呵护,有人说,萧红是一个一生都在追求解放的新女性,可令她沉溺的爱情,其实是另一种束缚,此言非虚。

萧军当然爱过萧红,但在这个大男人心里,爱之外还有轻视——他们在东北的初见,便是一场强者对弱者的拯救,那时的萧红无比落魄,萧军挺身相救并爱上对方。有人曾说,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爱,就是能包容其最丑的一面,这句话用在二萧的情事上十分合适,但萧红当时的落魄肮脏,想必也在萧军心中定格,作为拯救者,他从一开始就对萧红缺少尊重,这场爱情当中有着太多的不平等。

后来,他们都写下了留恋青岛的文字,留恋那段仅有的甜蜜时光,也不约而同说着依旧相爱,却不能在一起生活的话语。再不久之后,阴阳相隔。

萧军曾说:“萧红单纯,醇厚,倔强有才能,我爱她,但她不是妻子,尤其不是我的。”萧红则说:“我爱萧军,今天还爱。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,在思想上是个同志,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,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。”

这种掺杂矛盾的爱情最是煎熬,沉溺并依赖爱情的萧红更是难以从中脱身。尽管主动提出分手,但她对萧军的爱从未停息。据说,她曾在友人那里看到萧军再婚的照片,反反复复地看,久久无语,一脸哀婉。病危时,她还在幻想萧军能再次来拯救她,哪怕,只是一个拥抱。

可是,什么都没有。

1942年1月22日,颠沛流离的萧红在香港去世,年仅31岁。临终遗言里,她把《生死场》的版权留给了萧军,那是他们在青岛时的爱情见证。于他们而言,爱似流星。

【阅展所得】

## 三星堆文物来鲁展出

## 古蜀国与东夷文化共生互动

□本报记者 徐静

没有比“藏着的历史”更适合表达观看“太阳的传说”——三星堆、金沙遗址出土文物菁华展的感受了:凄美的神树、奇异的纵目、怪谲的面具、夸张的立人……三星堆有太多的神奇之处,历史的真实性也许一直掩藏在这些文物之后。

三星堆文化与正统中原文化的关系,学界有多种层次的讨论,作为比较的对象也不尽一致,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、川东鄂西史前文化、山东龙山文化、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……仅就罗列的这些文化来看,三星堆研究已是争论迭出,这无疑是由三星堆文明本身的丰富和辉煌所决定的。

正在山东博物馆展出的三星堆、金沙遗址出土文物菁华展,为何以“太阳的传说”为主题,雄踞西南的古蜀国和古老的山东东夷族群,难道其文化特征与信仰表达真有共通之处?

作为古代中原周边地区颇具典型意义的“古国”,史籍却鲜见蜀史之详载。直到三星堆遗址横空出世,证明了古蜀文明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代表。三星堆遗址大型商代祭祀坑位于四川广汉,因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,与北面犹如月亮湾隔河南北相望,成就了“三星伴月”的著名人文景观。晚于三星堆的成都金沙遗址,具有明显的文明延续性,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。

在展厅门口最显眼处,一轮灿如金轮的巨大光环掩映着一尊青铜大立人像。据说这尊青铜像的真身是全世界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像,与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一样,是从不外借展出的“国宝”级藏品。而金色光环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,正是金沙的太阳神鸟金饰,整个图案似一幅剪纸线条流畅,金饰内层为齿状光芒,外层由四只首足相接、同向飞行的鸟儿组成,生动再现了远古人类“金乌负日”的神话传说故事,体现了古蜀国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。

“三星堆文化并不是孤立发展的,它与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存在着密切联系。一是崇拜太阳、以凤鸟为图腾,二是以牙璋为重要礼器,反映出两种文化从信仰到礼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”参与本次展览布展策划的山东博物馆点藏部王冬梅女士告诉记者,作为巡展,三星堆、金沙文物展在其他省份展览的主题有的叫“古蜀探秘”,有的叫“三星伴月”,而在山东,主题定为了“太阳的传说”。

太阳崇拜是古蜀宗教文化的中心,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所出土的反映此种崇拜的大量器物、纹饰是有力的实物例证。在本次展览中,有件颇具现代感的青铜“太阳形器”,其实就是三星堆先民崇拜太阳的遗物,这件造型简洁的青铜器直接颠覆了我们印象中青铜器厚重华丽的“饕餮”形象,中心似轮毂的大圆泡直径约28厘米,有5根似轮辐的放射状直条与外径相连,代表着太阳与四射的光芒。据了解,十日神话与射日神话在古蜀国也极其盛行,在古时太阳对农业丰歉攸关,崇鸟也就是崇日。太阳信仰深植于古蜀文化观念,此信仰一直延及东周,如“华阳国”“开明王”等国家别名或族号也深深打上了这一信仰的烙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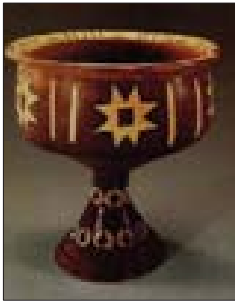
日出东方,凤鸣朝阳,山东古老的东夷族群也流传着太阳的传说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,中国的太阳崇拜起源于日照一带。史前海岱先民有着太阳崇拜以及鸟信仰的原始宗教观念,最早可以追溯到北辛文化时期一些器物上简单刻画太阳纹,大汶口文化阶段则开始频繁出现八角星纹,而后出现的陶鬻及龙山文化鸟喙足鼎,便是太阳崇拜与鸟信仰相结合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。不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出土实物,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星堆文化与东夷文化在太阳崇拜上有所联系,而关于此种联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,还有待研究。

在本次展出的三星堆、金沙文物中,有众多的玉石礼器,其中以牙璋最有特色、数量最多。《周礼》中曾有记载,“以玉做六器,以礼天地四方……赤璋礼南方”。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的数据,自20世纪以来,牙璋在三星堆出土次数达五六次之多,数量达七八十件。其实,作为古代重要礼器之一的牙璋,最早发源于山东龙山文化遗址,然后由东向西传播到陕西石峁,再到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发扬光大,然后再传播到四川的三星堆、金沙,在商晚期至西周掀起一个高潮。

对于商周以前中国的各个部落,我们只能靠出土的有限文物去了解,那些神秘的图腾提醒着我们远去的历史:太阳、神鸟、玉牙璋……在三星堆、金沙文化中的,确可以看到不少与中原文化,包括山东东夷文化相似的东西。这并不奇怪,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在封闭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,三星堆也不例外。



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太阳形器



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八角星纹彩陶豆